

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贾平凹

浅浅是我的女儿,从小就喜欢写诗,我只觉得好玩可爱,但从不敢劝她将来当作家诗人。文坛上山高水远,风来雨去,人活得太累,并且我极不爱听文二代之说,这样的帽子很容易戴被上,既丑陋,又硌得脑袋疼。在二三十年里,我仅呵护她的上学、就业、结婚,指望着一切能安康平顺,岁月静美。等到她的两个孩子终于上小学了,家里没了凌乱和嚣烦,有一日她送我烟酒还有几首诗,我才知道她其实还一直写诗,只是有的写在日历上,有的写在手机上,有的能念出来还没有写下来。

唉,诗这东西像种子一样,有土壤水分了就要拱土发芽,生叶抽枝的。我读了那些诗,觉得有意思,她说不够发表水平,我说,就是够发表水平也不要发表,诗可以养人,不可以养家,安分过一般日子吧。

她是听我话的,生活得简单而安静,偶尔给我手机发一首诗。我对她的诗越来越辅导不了,以我的爱好,总是回复一句好或是不好,建议她给她认识的几个诗人发去让人家看看。此后很久的时间,她不再发诗给我,或许她觉得我老打击她,或许也觉得我真的不懂诗。后来我所知道的,是一些朋友认为她写得还好,竟替她把一些诗稿投给杂志,竟受到肯定,有了许多赞许的话。

人真是奇怪,受了鼓励,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虽然这火山上冰雪覆盖。这一点上她有点像我。

她现在已经不小了,说起来有父女的名分,实际上我是我,她是她,她早不崇拜我,我也无法控制她,何况诗是她的,与我毫不相关。她的诗在各种杂志上不断地发表,偶尔我读到了,也让我惊讶,她怎么有那么多奇思妙想!那些句子是她这个年龄人的句子,是这个时代的句子,我是远远撵不上了,倒生出几多感叹和羡慕。

我曾经给许多人写过序,给许多书画展览、新书发布会站过位,而浅浅要做公开的诗人了,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却因别的事外出,不能到现场祝贺,就写几句话赠送她。我要说的是,既然一棵苗子长出来了,就迎风而长,能长多高就长多高,不要太急于结穗,麦子只有半尺高结穗,那穗就成了蝇头。

培养和聚积能量是最重要的,万不可张狂轻挑,投机迎合,警惕概念化、形式化,更不能早早定格,形成硬壳。作家诗人是一生的事,长跑才开始,这时候两侧人说好说坏都不必太在心,要不断向前,无限向前。

最后,我还要说:做好你的人,过好你的日子,然后你才是诗人。



读父亲信有感

□贾浅浅

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书房同别人说话。我坐在他的旁边。屋里的菩萨和小兽默不作声地望着我,而我的头却抬不起来了。说不上来是感动还是悲伤,心头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喘不过气来,我忽然哭出了声,眼泪汨汨地流着,像要接满桌前放着的那块凹石。他侧着身子,看着我,声音柔软地说:你还读哭了?!我知道他有时还拿我当小孩一样,我也故意拽着他的袖子要把眼泪鼻涕往上抹。他嘿嘿地笑了,说是写了整整一个早上。

在家里,我是最跟他没大没小的两个人。常常当着屋里屋外的人搂着他的脖子,揪他的寿眉。着急的时候他会喊:不当当。过后依然在电话里按我的要求用响亮的亲吻结束。是呀,“文坛上山高水远,风来雨去”,他怎么忍心让自己女儿活得辛苦呢。这几年只有自己做了母亲,才会得出那其中的深意。“做好你的人,过好你的日子,然后你才是诗人。”这也许是全天下所有的父母对儿女的期待。我忽然就想起他在我婚礼上的那段讲话,也一样是这贴心贴肺的三句话。

“诗可以养人,不可以养家,安分过一般日子吧。”像开出的莲,它却长在淤泥里。“风刮风很累,花开花也疼。”当人们的目光都停留在腾空而起婀娜多姿的青烟时,往往忽略了那柱香的存在。

“长跑才开始,这时候两侧人说好说坏都不必太在心,要不断向前,无限向前。”这让我想起了他的创作,不就是这样吗。我划了根火柴,燃起一根烟夹在他的食指间,笑着说我想起了一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搔搔头说“好”。

一朵兰花瓣,正悄悄落下。



我与副刊的笔墨情缘

□叶 周

报纸的副刊版面是作者与读者交流最为亲近的媒介。记得30年前我发表的第一篇副刊文章是在上海《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那时报纸是传播新闻和各种社会信息的重要途径。每每临近下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车前的报兜里满满地垒起一摞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他们走街串巷,上海的各条小弄中都响着自行车铃的叮叮当当声。午后夕阳下,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一份《新民晚报》。如果在“夜光杯”写了文章,第二天一定会有人看到了你的文章。我曾经在上面写过家长里短,不久都会在熟人中得到反馈。

最有意义的一次是1986年8月,我发表了一篇千字文《二十年祭》,悼念“文革”之初含冤去世的父亲叶以群。我在文中写道:“这是20年前的一出悲剧,悲剧的病灶在哪里呢?挨整的人和成批的受蒙骗者都极虔诚地相信那被篡改了的信条,都在极认真、极仔细地反省自己,揭露别人……一幕幕人间悲剧就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抵御的情况下蔓延泛滥。这种全民族悲剧的病灶在哪儿?何以彻底地根除它?我权将这两个需要几代人深思熟虑才能解答的疑问录于此,以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祭奠!”

文章发表后,过了几天去作家于伶家串门,于伯伯感情真挚地说:“看到你写的文章了,写得很好,应该再写长一点,更详尽一些。”我理解于伯伯的心情,他对我的父亲有很深的战友之情,后来父亲的论文集出版,我请他作序。他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的文章发表后过了十多天,我又在《新民晚报》同样的版面上看见了巴金先生的文章《二十年前》。“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难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

在连载了两天的文章中,巴金先生回顾了运动之初上海作协的运动,他在文章中发问:“‘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知道真实。”

巴金先生与父亲在上海作协共事多年,共同负责《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他的文章面对公众重述了“文革”开始时上海作协的批判运动,特别反思了他当时的心态。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副刊上无意中与前辈的文章互相呼应,共同反思一场民族的悲剧,这是何等荣幸的事!

还有一次我与文友应约为上海《解放日报》副刊“朝花”写了一篇电影创作漫议,题目是《电影语言创新随想》。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电影创

新思潮正处于热潮,而当时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影协的刊物《电影新作》做评论版的编辑。初出茅庐就谈这么个大题目,如今回想胆子也确实够大的。后来听说当时的上海电影局长张俊祥先生那天正好从局办公室去上影厂文学部开会,看到那篇文章,他索性把阅览室里仅有一份的《解放日报》拿走了。当时上海是全国当之无愧的电影重镇,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人才和专家。可是在创新思潮来临时,上海却并未走在前面。我当年真乃初生牛犊不怕虎。

后来我把那篇文章寄给在北京的前辈陈荒煤先生,不久收到了他的回信。

寄来报纸一文已收到。因病忙乱,未能及时复信,请原谅!开始写作评论文章,最好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作品作些具体分析来谈某一种观点或问题、倾向,易于着手,也是一种锻炼,也容易为读者接受。

你们这篇文章就是如此,希望坚持下去。托人带给你散文集一册,作为纪念,并希指正。

祝全家好!并问你母亲好!

陈荒煤

二月十四日(1984年)

“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作品”,这是荒煤先生对我的嘱咐,为此我离开编辑部,去了上影厂的文学部,直接与作家、编辑打交道,更多了解实际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写出了更多的评论和访谈。那是一段至今回想依然向往的电影文学生涯。

副刊的写作其实不仅是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步,同样也在许多文学名家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上世纪初,一些著名报纸的文学副刊就承担着新文学摇篮的职责,许多名作家也是经常的作者。同时副刊又扶持了许多文学新人的作品,让他们崭露头角。

譬如香港《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该报的副刊“大公园”天天出版,王芸生、徐铸成、曾敏之,著名记者如范长江、萧乾等都是该版面的作者。巴金先生后来结集出版的《随想录》,最初也是在“大公园”副刊开始登载。

我与《大公园》的缘分始于2004年,那时去澳门工作。母亲让我去香港时拜访一下《大公报》的编辑盛北星先生,他的父母和我的父亲曾经在香港共事过。随后我给该版面写了数十篇文章,其中有《回望郭沫若》《赵丹的遗憾》《父亲背后的人——周扬》《文坛巨匠矛盾的大管家》《难解生命之缘——以群和潘汉年》等,其中20多篇都是关于文坛前辈的故事。后来根据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文脉传承的践行者》由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收藏了。而我所以能连续写出这些文章,应该感谢《大公园》副刊编辑孙嘉萍的鼓励。如今回想,那是我最勤奋地给副刊写稿的岁月。那些稿子在香港出版,而后又经过网站在国内的其它媒体上转载。也是在这些不间断的写作练习中,我的散文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

报纸的文学副刊,一个版面通常也就是一个主编独立完成。他们与作者的交流方式也各有特色。

有一次听《台湾联合报》副刊主任宇文正做报告,她幽默生动地为与会者描述了作为副刊编辑的酸甜苦辣。她说每一次作者的投稿都让编辑认识一位不同性格的作者,在安静的副刊编辑室里,略显琐碎的工作中,他们也会从中享受到乐趣。看到视角独特的作品,他们会互相分享;遇到紧追不舍的作者,他们更难免无奈。

她特别说到,不论何种理由退稿,都不会得到作者的信服。若说文学性不够,时常被问:什么是文学性?若说:在同类题材中稍弱,又会被问:谁写得比较好?诸如此类,永远不会有满意的答案。会场上编辑的苦恼引来作家的一阵阵笑声,在笑语欢声中编辑和作家们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而像《世界日报》副刊的退稿信,只说“此稿不合适,未录用”,或许也是给作者留足了面子。因为副刊编辑人手往往紧张,也确实太忙,各种工作流程要花去不少时间。

《世界日报》副刊在北美很有影响力。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版面设计。主打的文章通常是通栏标题,篇幅占去三分之二的版面,并且还请画家画一些与文章内容相关的插图,整个版面图文并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散文《城市历史中的爱情》,分成上下连载,两天的版面上都有画家的插图,体现了上海的氛围。因为文中写到电影明星周璇在上海的故事,插图中还画出了美丽忧愁的周璇。那样的副刊版面设计很别致,成了我珍贵的收藏。很显然在电子时代,简洁的电子版面是无法比拟的。

当然也有的编辑很热情,会写详细的信与作者交流。我曾收到《侨报》副刊“文学时代”的编辑几百字的回信,就我的散文《我的香港情缘》进行交流。副刊责编颜茵在信中写道:“您的描写总是细致入微的,情感也是细腻的,读到‘如今,我每一次走在香港的街道上,都设法在纵横的街巷中,穿梭的人流中,找寻他们当年的足迹和身影’时,我眼前都能浮现出一幅画面:现代繁华的香港街头,人来人往,行色匆匆,市声如潮,而你身披旧时光,一脸宁谧地穿梭在这个城市,想像着自己的父母,姨婆等亲人也曾走过这条街道,穿过那栋楼宇,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地标落入眼里,与您记忆中的地名重合,积累成思念……也许,您生来就比别人多一份职责,对于历史的职责,注定要无数次走进历史的风云,通过挖掘和保存家族史,向世人呈现更多中国名流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体现着人性,让我们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看见一代人的风貌、精神与坚持。感谢您不遗余力地用文字去追寻与记录,期待您的新作!”

这位责编热情洋溢的信感动了我,我即刻给这位编辑回信,告诉她这样的信多么难能可贵,“很高兴与您交流,让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受到了鼓励!”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报纸的副刊也应时代迅速变化,向电子传媒发展。对于远在美国的我,觉得特别方便,能够及时看见自己的作品得到传播,还能立刻通过手机分享给朋友们,喜欢的朋友还可以即时转发,世界真的变得越来越小。文学副刊在电子时代,应时代的变化做出改变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副刊是近百年来在作者、编辑和读者之间架设的沟通桥梁,其所体现的人文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加倍珍惜。

举目一望,4000个光头!阳光下,一大片亮晃晃的头顶,占满一座大操场,感觉真有些异样。他们个个抿紧嘴唇,专注的目光聚焦于我。想想他们曾经有过的罪行,不由得紧张起来。

这是在四川省嘉陵监狱的“阅读未来,奔向新岸读书活动”的开幕式。主办方让我就《让兰辉告诉世界》这本书给服刑人员讲话,时间限制在几分钟以内。之前,我错以为“讲话”是一个小时,准备了几千字的讲稿,看来用不上了。我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将我想说的话一口气说完。情急之中,我看到大会屏幕上“读好书,做好人”六个大字,心中一下子找到了感觉。

于是,一上讲台,直奔主题:“我写的这一本《让兰辉告诉世界》,讲的是一个好人的故事。兰辉,是北川县因公牺牲的副县长。曾经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团干部、公务员。他牺牲之后,我就到他工作过的白妮小学去采访。白妮,是远离北川县城140里的偏远山区。当年,兰辉在师范毕业后才18岁,分配到白妮小学教书,车只能开到公路边上,要走40里山路,蹚过十几道山溪才能走到。我到了之后,请学校找最调皮捣蛋的学生给我讲兰辉的故事。结果来了三个牛高马大的壮实汉子。他们都是40来岁的人,他们说起当年,有的家缺少劳力,有的家穷得连中午的干粮

面对4000个光头

——记一次特殊的讲话 □谭 楷



都拿不出来,旷课是常事,兰老师一家一家地做工作,反复说:一个也不能少!结果,他那个班上的学生,不仅没有旷课的,迟到的都很少了。

“因为白妮小学周边溪流湍急,一下大雨,涨洪水,上学就困难了。所以,每当下雨天,兰辉早早地站到河边上,学生就在河对岸等着,让兰老师一个个背过河。河水又凶又猛,有的地方淹过了肚脐,

如果踩虚了,摔了跤,很危险。放了学,他又一个个地把学生背到河对岸。

“这三个大汉说,若不是兰老师背他们过河,他们永远读不完小学。他们班41个同学,一个不少全都毕业了!更让他们自豪的是,41个同学,有的读了大学,有的经商,有的当干部,有的在白妮当农民,全都是好人!”

“读者朋友们,如果你们小时

候遇上了兰辉这样的好老师,背你们过河,也许你们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现在,你们渴望渡过一条波翻浪涌的河,谁能帮助你们?多读好书!好书之中就有兰辉这样的好人,会帮助你们走向新岸!”

“读好书的目的是做好人。兰辉教书是优秀教师,当官是最接地气的好干部。他没有做轰轰烈烈的大事,点点滴滴都是为了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评价的那样,‘兰辉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上的最高位置。’所以,兰辉不死,他永远活在北川人民心中。”

“送别他那天,灵车过处,万人空巷,北川的天空大雨倾盆,北川的群众泪如雨下。10个月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兰辉》。拍送别那一场戏,需要2000群众演员,哗——来了6000人!全是自愿来的。导演本来要给群众‘说戏’,一看,个个胸佩白花,臂系黑纱,表情沉痛。还说什么戏?一开机,6000群众目送灵车缓缓驶过,泪流满面。导演、摄影师一边拍一边流泪。两场大雨,使我深受感动,人生一世,什么是最高的追求?第一要紧的是做好人!”

讲完之后,台下响起很热烈的掌声。光头们的目光都变得热情而亲切。返回成都的路上,我收到一条短信:“讲得非常好。我相信,今天一定有人因此而改变命运。”

仰望星空,我想说:“兰辉从来没有停止。他还在继续救人。”



王恤珠作品

原上草

臧克家

第314期